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七期 ——
(二〇〇七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4c)

【史海钩沉】北大迫害林彪女儿林立衡事件	王友琴
【一家之言】林彪反毛之我见	刘自立
【旧文重登】这样的红卫兵	殷海光
【春秋史笔】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	佚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北大迫害林彪女儿林立衡事件

• 王友琴 •

《罗生门》是一部国际闻名的日本电影（一九五〇年摄制），故事描述当事人出于各自的利己动机及价值观念，可以对事件作出完全不同的揭示。影片深具震撼力。在对文革的描述中，可以一再看到这样的“罗生门”现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北大大饭厅举行了一场批斗会，批斗陆平、王学珍、孟广平、向景洁四人。

陆平是文革前的北大校长、中共党委书记。王学珍任过代理教务长。孟广平是北大教学行政处长，向景洁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他们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都已经被打倒，被称为“黑帮分子”。这天批斗对象的罪名是：“迫害林立衡”（林彪的女儿）以及“迫害林副统帅”。

◇ 北大“迫害”过林立衡吗？

林立衡是林彪和叶群的女儿。一九六四年春天从清华大学二年级转学到北大中文系二年级。

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教育部为林转学正式发文给北大，北大接受了林立衡。林立衡转学到北大后，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她的功课。

林立衡到北大后经常缺课。在超过了规定的缺课期限后，中文系派她的班主任到林家探望。林家说林立衡身体不好，失眠。后来林彪的妻子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关光烈曾为林立衡事，到北大中文系与副系主任向景洁谈话。他们说林立衡将到《空军报》工作一段日子。中文系建议，有病长时间不能上课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病好后可以复学。林家送来了休学申请。中文系写了报告，送到学校教务处。教务长同意后，又特别送呈校长陆平。陆平批示“应按规定办事”。

林立衡办了休学手续后，再也没有来北大复学。她去了《空军报》。她以小名“林豆豆”发表了纪念当时去世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文章。仅此署名当时就很引人注目，因为显示了作者的特殊身份及其重要性。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六月，毛泽东发起在广播和报纸上攻击北京大学。北大被称为“反动堡垒”，北大领导干部被指控为“黑帮”。林彪则急剧走红，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立衡的弟弟林立果那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写信“强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林立衡同志”。后来，一九六七年初林立果加入空军，直至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衡在文革中成为《空军报》负责人。在这种背景下，她的“因病休学”就成为被“反革命”的“迫害”。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大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事件。向景洁副主任遭到殴打和侮辱。学生把厕所的垃圾篓子扣到他头上，打得他满背青紫条痕。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和教授等。到了八月，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向景洁和程贤策都在校园“劳改队”里，而且都被剪掉了头发，遭到各种侮辱和殴打，包括用铜头军用皮带毒打。程贤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服毒自杀。程贤策死后，中文系立即开会“斗争”其他“牛鬼蛇神”和代表程贤策的一个白幡。向景洁随之成为中文系头号“牛鬼蛇神”。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校园里的高音大喇叭广播：“黑帮分子向景洁听著，勒令你今天下午一点半到大饭厅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另外还对“黑帮分子王学珍”和“黑帮分子孟广平”做了相同的“勒令”。向景洁去了会场。被“批斗”的人在台上站成一排，低头弯腰。口号声四起，“打倒反革命分子X X X”，有一个口号是“X X X迫害林副主席女儿罪该万死”。他们听了才知道这个“批斗会”的主题。向景洁被“斗争”，是由于他具体经办林立衡的因病休学手续。

◇ 北大的人因林立衡受到残酷迫害

过了几天，五六个学生闯到向景洁家，把他叫出来，在走廊上用预先准备好的麻袋把他的头蒙上，把他绑架上一辆汽车。东转西转开了一段时间后，把他押下车，在一个房间里解开了蒙在他头上的麻袋。他们用强灯光照射他的脸，他们自己都坐在台灯后面的阴影中（这一套显然是从电影上模仿来的），开始审讯他，要他“交代”如何“迫害林立衡”，迫害“林副统帅”。窗户都是蒙死的。他从房间内部结构，看出那可能是学生宿舍二十八楼。他被审讯和折磨一夜之后，又被蒙上麻袋，被架著走了很多路。在一个地方停住了，被解开头上的麻袋。绑架他的学生说：“滚蛋。”那时候他看到是在未名湖边，靠近小石桥的地方。

王学珍也被这样麻袋蒙头绑架过。

这个所谓“迫害林立衡”事件，至少可以表明以下几点：

1、在文革前，林立衡享有特权。北大给了她特殊待遇。但是北大还在一些方面有原则，如她转学来北大，学校未肯直接接受，而是要求教育部下指令才行。接受了她做学生，但是要求她补上功课，也不允许她随便不上课，她的特权受到了某种限制。这就是所谓北大“迫害”林立衡的内容。

2、文革指控北大“迫害”了林立衡，说明文革实际上是在扩大已经拥有的特权，并且发展到了绝对不受限制的程度。而且，这种类似的指控在很多学校发生。现在有一种文革提倡平等的说法，离开事实极远。

3、实际发生的不但不是北大“迫害”了林立衡，而是北大的人因她而遭到残酷迫害。向景洁等人遭到长期的批斗、殴打、侮辱以及心理折磨，其程度是极其严重的。

4、文革过程并不具备甚么理想主义的或者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名为“造反”，实际上致力于建立最高层的绝对权势，而且运用了野蛮的手段甚至恐怖手段。

这只是北大文革中大量发生的残酷迫害的很小的一部分。文革中北大有六十三人被迫害致死，即北大师生员工每二百人就有一人被害死。北大这个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成了迫害、监禁和杀戮之地。

◇ 对受害主角向景洁的“独家采访”

笔者曾经三次访问向景洁老师。他是最为了解林立衡休学事件的人。向老师讲述了林立衡休学的详细过程，包括他和林彪的妻子叶群以及秘书关光烈的谈话。

向景洁老师说：林立衡原在清华大学念书，转到北京大学，甚么原因不清楚。但是由于北大中文系和清华的课差别大，中文系指定了马真、李义华两个女老师作为她的个别辅导教员。这是极特殊的照顾了。经过了大半年，发现她经常不来上课。要是都算旷课的话，就够被开除了。对林立衡，我们是特殊化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原则，没有让她自由不上课。

系里派了她的班主任宋祥瑞到她家看望，把系里的意见告诉她：有病应当请假，生病上不了课要有请假手续。宋祥瑞去了回来向系里报告了家访情况。不久后，林彪的秘书关光烈来北大，是我接待的。关说了林立衡身体不好，不能来学校上课，想要暂时改变生活环境，到《空军报》工作一段时间。我说，既然是暂时改变生活环境，可以先办休学。以后身体好了，可以办理复学手续。休学不能超过两年。关光烈听了很高兴，说原来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可以办休学手续，他要回去汇报。接著闲聊起来。他还给了我一个中药偏方。我注意到他字写得特别漂亮。

不久以后，叶群来了系里。她对学校派了两个辅导教员表示感谢，说他们不了解学校里的规定，听了学籍管理规定的介绍，她同意办理因病休学手续。我说，林立衡写报告，由家长签名就行了。这时候，我出去接了个电话，是学校打来的。我接了电话回来，和叶群继续谈话。文革“斗争”我的时候，说我“竟敢”在和叶群谈话中去接电话。说我们迫害了林立衡。其实，我们照顾还来不及，谈何迫害？

向景洁老师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北大既没有迫害林立衡的动机，也没有迫害她的行动。他们只是执行了当时的学校规章。向景洁的说法也是诚实的，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英雄，抵制不良行为的好汉。实际上，文革全面反对和攻击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将其定罪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不是只攻击其中的个人。文革也确实在这方面达到了目的。文

革中大学停课四五年后，重新开始招生，不再有大学入学考试，而是由各地共产党组织决定谁可以上大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三年送他认识的五名女演员或宾馆服务员到北大上学，不必经过任何公文手续。

向景洁老师跟笔者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谈话是一个确实实的“独家采访”。他没有和别的人正式地详细地谈过此事，自然也没有发表过有关报导。这在文革研究中是一个严重的不平衡，即受害者至今没有多少机会说出真相。对文革历史，受害者至今仍然很少说话权。

◇ 文革北大报纸和北大校史的记载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的《新北大报》说，林立衡在北大休学是“是残酷迫害林副统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反革命事件。”一月十五日《新北大报》又发表文章，相当详细地指控“迫害林立衡”事件。文章以典型的文革的“上纲上线”的手法，说林立衡办休学手续，是一九六四年刘邓“篡党、篡军、篡政”计划的一部分。文章还说，林立衡神经衰弱、失眠，是“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为了“从政治上、身体上、精神上甚至从亲属身上迫害林副统帅，以达到他们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目的”。文章展示了北大教务长崔雄昆在中文系有关上报材料上的批语：

我意按规定办事，该休学就通知休学，否则对本人也不好。

崔雄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文章紧接著发挥：崔雄昆要破例地请示陆平，不仅表明逼迫林立衡同志休学，已不是一般的学籍处理问题，而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陆平批示道：“应按规定办事。”文章写道，“这两个混蛋就是这样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就这样林立衡同志被万恶的陆平黑帮和三反分子崔雄昆赶出了北大。”

很容易看出，崔雄昆所以“破例”请示，无非是因为林立衡是林彪女儿的特殊身份，因此他格外谨慎。

一九九八年，北大为庆祝一百年校庆出版了《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至一九九七》，其中简略记载了一九六八年的这场批斗会：校文革以“迫害林立衡”（林彪的女儿，曾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后以身体不好自动退学）的罪名，批斗陆平、王学珍、孟广平等。

这部校史记载了文革十年中的事件，也记载了一部分受难者的名字。这在校史写作中是比较严肃认真的。不像有的校史撰写把文革那一段“跳过去”。但是，北大校史把被批斗的向景洁省略了。校史记载的受难者之中，只记载正教授，连副教授都不写入，遑论其他人。

二〇〇〇年，笔者向一名文革时在校学生问起此事。他说，那个“批斗会”他没有去，可是听见了大喇叭里满校园大喊大叫：迫害林副主席罪该万死。觉得北大这些干部，迫害林彪？能迫害得上吗？可笑。

我相信他说的当时的感受是真的。而且感到“可笑”的人，这位受访者绝非仅有。

文革中有两类指控。一类是编造事实，是捏造的。一类是按照文革的原则加以评判而定罪。

也有两类混合在一起的。北大的人显然知道向景洁等不是“迫害”林立衡，指控是不合事实的，但不能不随大流参与批斗。

◇ 林立衡今天怎么说？

文革开始后，林彪当了五年的第二号权力人物。然后，他和妻子、儿子都死在出逃中国的飞机上。林立衡没有和家人一起离开。她被“审查”了一段时间。一九九〇年代她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

二〇〇六年二月出版的香港《多维》月刊上有记者高伐林在北京采访林立衡的长篇报导，有五整页长，外加两页对林立衡的保姆的采访。介绍林立衡作了多项近代历史研究专案和其他活动。包括参加“十大元帅”子女的聚会，还对一件事情表示很不满意：她和别的元帅子女照了相，可是印出来的画册上，照片中有她，但说明中却没有她的名字。

报导提到一九六〇年代她上北京大学，却没有提任何其他关于北大的事情。她在访谈中对北大师长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事，也没有提一个字，当然也就没有表示道歉。

笔者问了记者高伐林，是否林立衡在采访中说过道歉的话，而他忽略没有写入？高伐林声明，绝没有这样的漏记，只是她没有说。报道也没有写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

上文说到，在一九六八年，林立衡神经衰弱失眠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迫害”所致。在二〇〇六年的这篇报道中，林立衡解释她的三次自杀（其中一次在一九六四年，入北大之前还是之后？），是“高墙深院，与世隔绝，又有一个严厉苛刻的母亲”（报道中详细讲述了叶群怎么打过林立衡）。

◇ 林立衡和李讷至今没有一句道歉

林立衡认为林彪是“冤案”，是她母亲和弟弟挟裹林彪出逃。她当然可以保持她的这一看法。但是她对文革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绝口不提，似乎没有发生过。则完全违反了事实。

数名北京大学的受访者都提到，他们对林彪女儿林立衡以及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至今未向他们受害的北大师长道歉，感到气愤。这两个人文革之前是北京大学学生，受到多方照顾，在文革中却指控北大“迫害”她们。后果不但使北大作为整体遭到攻击和破坏，而且牵涉到的个人长期遭到残酷的迫害。

文革前，一九六四年，历史系教师郝斌和毛泽东女儿李讷等学生一起下乡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因为不同意粗暴对待“富裕中农”和李讷发生过并不严重的争执。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上指控郝斌“迫害”她的女儿。从此郝斌成为“现行反革命”，长期遭到“揪斗”并被关在“牛棚”中被“专政”，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前夕，为了“纪念”江青的这一讲话两周年，北大历史系革委会专门把他从远郊的“牛棚”中拉回系里“斗争”。因为他是江青确定的“反革命分子”，是铁定的“死老虎”，所以连同为教员的系中同事也敢在会上出手把他打倒在地。他被打得昏死过去。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文革《新北大》报上，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记述此事。文章开头说：“两年前的今天，敬爱的江青同志在我校万人大会上把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份子郝斌点名揪了出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我们怀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对江青同志的无限热爱，立即揪斗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结尾说，要

把郝斌“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了一九六四年和毛泽东江青的女儿的一点争论，如此残酷地对待一名教师。文革的蛮横与凶暴，已经到了甚么程度！十一年以后郝斌才得到“平反”。

北大人说，李讷和林立衡，当初是文革的活跃人物，如今仍然出现在媒体上，而且都住在北京，离北大不过数里之遥。她们应该忏悔和道歉。不是要她们也被“批斗”，也被“坐飞机”、挂“黑牌”、剃“阴阳头”，也不是要她们也被关“牛棚”或者进“专政队”“劳改”，也不是要她们写无数“认罪书”诅咒自己，只是要她们简单地说一声“对不起”。但是，她们就是不说。

北大人也说，她们两个道歉，对北大的受害者来说其实并不能弥补甚么，但是，对我们共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来说，说清罪恶与是非是重要的。她们不道歉、不忏悔的做法，在今天的社会中散布著不道德的臭气。

◇ 毛照办：把几个女演员送进北大

所谓“迫害林立衡”的指控，在林彪死亡以后虽然不再算是北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事件中包含的文革思想原则，仍然继续实行并发展。一九七三年，毛泽东送三名他认识的杭州的年轻女演员到北大历史系读书。前一年还送过一名庐山宾馆的女服务员到历史系，还有类似的一人到哲学系。毛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办公室发文，如文革前林彪一家不得不作的那样。北大不能要求考查那些人的文化水准，也不必麻烦为他们派甚么个别辅导教师。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我也是一个人，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把“走后门”上大学说得理所应当，而且他说，“几个女孩子”，连数目都没有说出。假使要由教育部门发出公文让北大接受，至少还需要写出准确人数，不能如此随便。在这方面，官僚机构和公文体系对毛这种自命“无法无天”的行为多少还有阻碍。

假使在一九六四年北大就按照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来做，也确实就不会发生林立衡所受到的那些“迫害”。从一九六四年林立衡在北大被要求办休学手续到一九七五年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北大“迫害林立衡”事件之后，文革给学校系统造成的一项实质性变化的轨迹。

有人用“中国的封建传统”来解释文革的发生。这个理论对说明文革的有些部分或者有效，但是不能解释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情。中国古代的皇帝历来给皇子皇孙请教师，不曾令子孙指控教师“迫害”他们或对教师实行暴力惩罚。中国的学校几千年来有考试制度，学位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决定而不是由皇帝随便写名字拟定的。主考官舞弊，在古代会受严厉惩罚，这方面的案例之一是鲁迅的祖父在清朝因此被判处了死刑。（鲁迅作品中提到过他祖父此事，但是从未认为判决不公。）

在北大发生的以毛泽东和林彪的女儿被“迫害”为由发起的种种攻击，是史无前例的。需

要发展更贴切而深入的理论模式，才能对这些事件做出有道理的分析 and 解释。也只有在对北大文革的历史做出清楚的记载、分析和解释之后，这恐怖的一页才可能真正翻过去。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一家之言】

林彪反毛之我见

• 刘自立 •

现在关于林彪反毛的主要论点是，他后期和毛的不合作态度，及其党羽炮制之“571”文件，说出了反毛的主张，因而，据说，成为林后期大大觉悟，甚至成为四五，或者以后民意指数中一个早期因数。这个看法是不是可以成立呢？

我们知道，党文化是一种无原则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者的文化。从大处着眼，共产主义者里，也许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文化人，他们接受了这个学说的基本主张，即为受压迫阶级喊话，抗争。这个文化的早期鼓吹者是人们很少注意的，如法国女杰特丽思当——有作者指出，她甚至早于马恩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特丽思当和当时活跃于法国复辟时代的左派人物如圣西门、孔德和浦鲁东，都是这类“人民主权论者”。而这个人民主权论，受到许多右翼人士，学者，官吏的反对。从梅特涅，俾斯麦这些专制大佬，到夏多布里昂、基佐和龚斯当等人的嘲弄和否定。在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左派，和右派不同之处是，他们都是未经革命或者复辟，当上或者介入官方者。这些左派固然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界和政界的鄙视，可是其真诚站在人民一面的面目是清楚的。

这些左派和列宁主义，毛主义者的巨大不同在于，他们不是首鼠两端的革命者加官僚。后者对于革命，是极其虚伪和伪劣的。我们的意思是，毛和林这样的革命者，与其说是革命左派，不如说是窃取革命后果的独夫民贼。他们的革命，在最早时期的伪装性和伪劣性，其实早有蛛丝马迹，如其瑞金、延安时期的残酷党争和迫害，都是后来人民革命和文革的预演。

在这样一种历史里成长壮大的革命者之个人人格和人性，早就把上述一直在野和极为知识分子型的左派本质扫荡得一干二净了。在主张党文化内涵的无是非、讲权术的早期党争中，林彪一类人和后来成为文革敌人的刘，归于一类——这是人所尽知之事。

文革初期，这类机会主义的演技在，比如，周恩来的表演中，就有小儿科的重演。他跑到清华大学为老蒯平反，就大讲党在对敌斗争里讲过的民主和自由。他号召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像对待国民党一样拿起民主的武器，大讲言论结社自由云云——试问，周难道不知道他的讲话如在1957年，究竟会是如何吗？

我们的意思是，周当然知道，他讲的这些话，是为了响应毛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完成了毛的政治意图以后，这个讲话就被忘记不提，扔进垃圾堆了。换一种说法，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这个抓，这个促，如在1966年8月，当然是不可以讲的——那时候，是要讲造反的。再比如，到了上山下乡时期，对于文革早期毛周号召的造反，毛周当然要去之为要，根本不可能再讲。这个演变，在历史上重复了N次。从重庆，到南京，到北京。后来，毛说，我们就是独裁，即告结束——这个结束，是结束后的开始，文革了，毛就说，我们要造反，民主了——他不可说，在1966年说，我们就是独裁——到了打倒刘，他就又说了，我们要民主法制了。

事情非常清楚。

比照林彪同志，他，是不是知道上述党文化的一整套做法呢？他很清楚，很门清。

在1964，65年，他完成了批判彭，和毛沆瀣一气。出任国防部长。又炮制出一系列造神运动的货色，为毛复出主导地位不遗余力。中年一代中国人都知道，毛语录，四个第一，政治挂帅……一系列的林氏观念，作风和宣传的出现，使得天有二日之毛那个日，更加灿烂辉煌起来。一言蔽之，把毛打造成为神以后，刘邓陈的世俗地位，就变得不那么有威胁性了。毛成为铺天盖地的政治文化存在。中国政治生态，成为毛一树遮天的宗教狂热之天下了。于是，毛说，我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就是因为，他膨胀得像个硕大无比之神在了——而刘，还是一个世俗中人。这个对比不得了。这个对比是林彪的杰作——在此意义上说，没有林彪的造神运动，毛是无法翻身的，更不能造反和革命。他在掩饰世俗宪法和党章的前提之外，让林某人为他找到无法无天的神圣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我毛某人是无限大，无限正确，无限顶峰，无限天才的。林，究竟相信不相信他自己说的这类昏话呢？当然不。但是，也当然不是“不”。因为，他明确讲过，“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政治斗争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等等。没有人知道林彪和毛是不是马基亚佛里主义者，但是，他们懂得党文化，懂得辩证法，这就够了。加上毛对于封建权术的烂熟于胸，对付真理，诚信，原则一类真宗教，真教旨，就变得有办法，有策略，有经验了。林彪是很有经验的。简单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挥霍国人肉体的人民将领，早就知道何为人海战术——用他的话说，叫做人民战争。在血腥的战场上，在可耻的牺牲掉三十万老百姓的生命的长春之战里，在一系列辉煌的几大战役里，林，早就百炼成钢了。这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会有什么关注民生，良心和人道的任何心理动机和政治考量吗？见鬼！

事情回到文革。林彪在毛身后嘶声力竭地叫喊“横扫”“打倒”……之时，他的拥毛的地位被历史固定在文革的耻辱柱上。

正是由于毛这个被林造就成为神的俗不可耐的世俗人格，独裁人格，革命造反人格，使得他的国家，变成屠场和疯人院。他的文革，一般而言，其第二号人物势必面临被怀疑和清洗的命运。林阴错阳差，陷入这个由他本人全权负责的第二号位置。于是，所谓的反抗发生发展了。

所有这些所谓的反抗，人们多多少少有了记载。我们看到，林在庐山上的做为。他的天安门表演。他的抗拒不检讨。他的出逃——或者被火焰喷射器击毙。云云。

人们说，这个中国的格林和赫斯，在反对伟大领袖希特勒。

不幸的是，这个反抗显得多末可笑！

一，林彪反对毛，没有任何的思想实质。他既没有否定他鼓吹个人迷信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没有任何质疑毛的党文化的另类见解，只是，像我们以前说过的，成为和毛对峙的两条恐龙之一。

二，他没有任何反对和实行毛以外政治的资源。人们说，他撞击了那个体制。这个撞击，其实是撞击他本人和毛，并非是他来撞击毛。有知之士都知道，林的死亡，是连带他和毛双双在精神上的死亡，而非其他。只有那些活在党文化里者，才会别出心裁地把林彪之死，看成是对于毛的分离和对峙。



三，林彪的反抗其实完全没有出现在公共领域，只是一种私人之间，狗咬狗之间的隐秘抵抗。没有什么宣言和纲领，更没有除开党文化的其他选项。所有抽屉反抗，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一更不要说，是后来人，在追记这种反抗了一一重复而言，不见诸任何公共领域的反抗信息，对于文革或者其他全国性运动，其效果等于零。

四是，我们同样不知道如果林取代毛，国人有何幸运可言！

换言之，坊间所说，林是和蒋介石暗通款曲，要如何如何，更是天方夜谈。常识性的结论是，林的反毛成功，也许更是一番血雨腥风。

我们最大的惶惑是，何以文革四十年，革命，左派思潮百多年，共产主义思潮百多年，一个林彪现象，居然可以蛊惑 21 世纪的国人到如此地步。

换言之，林彪的做法，也许可以演变成为国富民强，那又如何！是不是要求邓氏时代改成一个林氏时代呢？眼下这个邓氏时代又是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

抱残守缺，成为中国人走不出革命死圈的基本成因。他们百般美化一切在西方百多年前早被质疑和否定的，类似“人民主权”一类说教。看不见整个自由主义如何在历史中经过君主，专制，革命和复辟中的施行及其影响。他们永远不愿意按照那些多少类似陈寅恪和吴宓那样的知识人，来思考一下，何以德末克拉西会演变成为德末克拉贼。民粹，暴力，集权，……诸如此类的怪圈文化，拴住了他们的双脚。

为了更进一步看看林彪的言说，我们不得不引用林彪的，现在被看成“思想解放文件”的“571”文件，且对此进行一下分解。在这个分解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贼喊捉贼的文件，是何等虚伪和危险——他在鼓吹反毛的货色里，加入了肯定党文化的核心，也就是林核心，以取代毛核心，如此而已。

我们引用一些同志引用的某些段落以做澄清。

——关于党内斗争：“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这段话究竟如何解读呢？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究竟是谁造成其不稳定呢？

这个不稳定，你林彪不负责任吗？你是最大的责任者。这个不稳定就是文革，文革前的造神运动——他废除了党的家规，信条甚至宪法，以致不稳；且天下大乱。

权力争斗吗？

你林彪不是念过政变经吗？你念经的本质不是要打倒刘吗？

军心……，不就是你说的，毛是最大的统帅，导师吗？

高级干部，不是你打倒的彭罗陆杨，彭德怀等人吗？

歪曲马列主义？你不是说是顶峰，几千年才出一个吗？

欺骗和蒙蔽？不正好是你用那本小红书搞的吗？

退一万步说，你说的对。那末，你首先要全盘否定你的早先的蛊惑和煽动，对你自己承担责任，定下罪责，然后，才可以这样假公正，假正统，假道学，假王道。

这样做，不是首先把你自己否定和打倒了吗？  
但是，你完全可以掩饰你的做为，而奢谈真理。

我们姑且不说，这类讲话散发的党文化重复过千百次，甚至可以制作一个文化厕所的全部材料了。

——关于社会状况，纪要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关于国际冲突：“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

你居然会说国民经济云云！你的政治挂帅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你林彪没有任何权利在此领域里胡言乱语。因为，你首先要清算你本身在文革前后，对于国民经济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害——你伙同毛，对于彭的批判，你的前庐山会议的“反右”，造成的危害，是和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害紧密相系，不可解脱的。帐，还没有算呢，你就跑来说三道四了？！

农民问题。这个直接是三年灾变的后续，和你文革初期，和你批判彭时期，紧密相系。你和毛同为农民的罪人。现在，你忽然跑到农民那里去了？可笑！

上层腐败？看看你的毛家湾吧！  
红卫兵被欺骗？你够健忘了，要狗血淋头才是。你在8.18的嚎叫你忘怀了？  
上山下乡？没有你和毛做出古今中外一概未有的停课辍学，哪里来的上山下乡？  
你的鼓励“破四旧”的喊叫，和你现在的同情，哪里有一点点共同之处？  
还是原话，你最初自我讨伐和批判了吗？你和毛的连裆裤子难道可以切割吗？  
国际矛盾的造就，难道不是你和毛的整体外交，革命输出之后果吗？

——关于毛泽东的整人术，纪要说：“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他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你在延安就是毛派。你在文革前的造神运动时，难道不知毛之为人吗？你大奸若忠，迫害“忠／良臣”，难道还要瞒天过海吗？什么是贼喊捉贼？就是林彪。

纪要中最具启蒙意义的一段话是：“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最后，这个搅肉机的主要零件，就是你本人。

你和毛一样，在滥用国人和国人的信任——其实信任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恐怖，屠杀和谎言。

你究竟是怎样把这个始皇吹捧成为天才和顶峰的，难道不用解释吗？

国人有权利对你的任何助纣为虐之道做出审判和谴责，而无论你是否后来迫于压力说了什么。

“B-52”是要负责的，同样，林彪，也要负责，是罪责。

只有林彪对于他自己所言所行之全部罪行服刑，定罪，他在571这个虚伪的讲话里陈述的内容才会被历史接受——换言之，他林彪，只有在因为罪行过于庞大，手法尤其恶劣，效果极为严重，而被判处起码无期徒刑以后的忏悔中，才可以获权出自我讨伐，间或讨毛（当然，是不是已经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如若如此，他连讲话的权利也会被尽数剥夺）——也就是说，他要在被完全定罪之后，厘清自身的罪责之后，方可以说这说那——而由他林彪说这，说那，其实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没有任何资格！

杀人犯可以谴责屠杀，但是，他首先要对杀人负责——这就是林彪问题铁定的结论！

□ 原载《议报》第254期

~~~~~

【旧文重登】

这样的红卫兵

• 殷海光 •

一

近来中国大陆发生一种举世注目和惊异的现象。就是，在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亚洲那块广漠的土地上，红卫兵像溃决了的黄河洪水似地到处横流。这种现象富于戏剧性，可并不是喜剧。实在，它里面蕴藏着悲剧。因此它很引起我的注意。本文的目的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客观的认知。我用的方法主要的是述和解析。我采的观点主要的是文化人类学及精神分析学。我征引的基料（data）主要的是《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因为，如众周知，《时代周刊》的报导一向比较平实——虽然它的评论在我看来比较保守。我希望本文在对于中国大陆红卫兵横流的这一现象之了解上，对有兴趣的人士能有些微帮助。

二

红卫兵之最初的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它是农民组成的“苦力”队伍。目前的红卫兵的主要成分是青少年知识分子。它是一支富于扰乱性的打斗队伍。今年六月中旬红卫兵的这一新的形式就开始出现。八月十八日，导演陈伯达发动红卫兵在北平和平门游行，于是“文化革命”正式揭幕。这个由十几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队伍，分列检阅台两旁，穿着系带子的军服，臂佩红色袖章。在事先安排好的计画之下，毛泽东出现，数百队员冲向台前。他们一齐高呼：

“毛主席！我们要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大概是红卫兵运动的正式“开锣”。

从这时开始，以北平为出发点，青年暴力的洪流向中国大陆各处冲激：呼喊、啡器、打骂，捣毁、侮辱、非礼，……

三

红卫兵的意底牢结（ideology）和行动是不能分开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底牢结支配着他们的行动；可是，他们的行动回过头来又影响他们的意底牢结。阿米巴的神经运动及细胞活动是很难划分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红卫兵运动，必须把他们的意底牢结同行动一起谈。依照我的观察，红卫兵的意底牢结“与”行动可以归摄为下列七个型类（Categories）

A 排外

毫无疑问的，中国大陆上的赤色分子是“我族中心主义的”（ethnocentric）。凡属抱持我族中心主义的集体一定或多或少是排外的。这是人类文化界域中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本不足怪。但是，红卫兵的排外，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他们普遍地抱持相当的仇外态度。而深藏在这仇外态度里面的，则是恐外症（xenophobia）。所谓恐外症，就是对于异乡人之变态的恐惧。我们现在列举红卫兵所表现的一些事证：

红卫兵的排外之组成因素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反帝国主义”；第二个层面是“反修正主义”。有训练的狼狗只要嗅到一点可疑的东西，就会咬。同样，红卫兵之反帝国主义，只要嗅到一点他们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东西之气息就反。他们看见“洋东西”就眼红，必欲毁灭之而后快，在他们的语意学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常常用成同义语。在广州一家理发店中，红卫兵说不该用有“资本主义气味的”头发油，于是和理发师冲突起来，大打出手，结果死红卫兵二人。我们很容易分辨得出“资本主义”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很不相同。但是，我们却分辨不出“资本主义”的头发油有何不同。如果二者有何不同，那么标准在哪里？特征又在哪里？是否“资本主义”的头发油臭些，“共产主义”的头发油香些？他们蹂躏北平几座基督教堂，污涂教堂的墙壁，用毛泽东的半身像代替圣像。他们在圣心学校外面贴标语，写着“洋鬼子滚蛋”。

和外国人有往来的人，红卫兵必加难堪的惩罚。有些医师被迫在水沟里跪行。为何情节呢？因为他们曾替外国人治过病。红卫兵们沿街骚扰，侮辱穿西服的中国人，禁止下西洋棋；不准剪西式发型；女孩子必须洗直卷曲的烫发。他们甚至认为金字招牌也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简直要不得。在“反修正主义”方面，赤色的青年男女们也一样积极。他们发誓要“无情地摧毁所有修正主义的温床”。苏俄被他们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司令塔。他们的“矛头”当然要指向这个司令塔。苏俄大使馆前面的大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在苏俄大使馆的汽车道上竖起毛泽东的巨幅像，不让苏俄外交官员离开大使馆，种种妙事，不一而足。

B 拔根

这里所谓“拔根”，就是要拔除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子。红卫兵对于这种工作也很努力。杭州灵隐寺是一个有名的古刹。佛教徒固然把这个古刹视为圣地，它也代表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的一面。可是，这些，对于在赤色统治之下成长起来的这群男女青年竟像毫无意义。他们侵入灵隐寺，并在佛像头部贴标语，写着“除旧更新”。中国大陆各地有历史价值的牌坊都遭拆毁。康熙是成吉思汗以后替中国扩张领土的帝王。他曾于十七世纪访问过杭州，并勒石纪念。红卫兵把这块有历史性的石碑破坏了。这大群青年的暴众，好像立意要把赤色统治来临以前的中国整

个毁灭。红卫兵的所谓“革命精神”，是要扫荡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及旧风俗的残余影响。”可惜得很，他们的举动跟旧土匪相差无几！

C 汪达尔主义（Vandalism）

汪达尔主义就是纪元后第五世纪汪达尔人的那些特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汪达尔人肆意破坏文明世界视为珍贵的文物艺术。他们对于大家视为美好的东西加以糟践；对于大家尊重的东西投以藐视的眼光，红卫兵的青年男女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实行“革命”。可是，从文明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正在实行汪达尔主义。张献忠主义是汪达尔主义的中国版。当然，“毛泽东主义”里含有很重的汪达尔主义的成分，也是张献忠主义的一延续。上面所说红卫兵之破坏历史文物的行径，就是奉行汪达尔主义。他们更没收艺术品。这些艺术品里有维纳斯女神和亚波罗的复制品。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投进火里。他们认为巴哈、贝多芬、莫札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是“封建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查禁。这是十足的实行汪达尔主义。

D 虐待狂

虐待狂的一种特例是性虐待（sadism）。性虐待是把自我性欲的满足和虐待对手方二事连系在一起。据外国记者报导，中国赤色统治分子因为恐惧人口爆炸，禁止早婚，并且禁止青年男女随便谈爱。这自然使得他们在男女之欲方面受到抑制。除此以外，主要因为从事战备，他们处处扣减一般人民的生活供应。情感生活及物质生活双方不能得遂所欲，就使他们感到挫折。“挫折产生侵害”。虐待是侵略的天然方式。一群饱受挫折的人是极其容易趋于残暴的。更何况有陈伯达创造的“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予以支持和壮气？有理论的暴徒比无理论的暴徒是可怕得多。我们看，红卫兵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红卫兵认为他们已经掀起伟大的革命新潮，他们正站立在潮头上，去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谁要是反对他们，他们便要予以改造，并且对之实行独裁，同时要“用枪刺来刺他们，直到我们的枪刺沾满了血。”这类举动甚至连他们的“苏联老大哥”也为之惊愕。据莫斯科的报导：“红卫兵殴打一个工人。因为他恰巧在一间屋子里，而红卫兵发现毛泽东像的框子破了。”又说：“他们用棍棒、枪托、椅子，和电线来打人。有一个人整夜遭拷打。他被打的昏了过去，他们对他浇冷水、继续拷打、直到死去为止。”他们的火焰还烧及外人，连共党“同志”也不能免。两个东德陆军官员被从座车上拖下来，像殴打“帝国主义者”似的殴打。

E 神话崇拜

红卫兵最大力推动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之对于他们，已经不止于是马列主义那样的意底牢结，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神话。例如他们说：“我们严厉警告美侵略者，英勇的中国人民配备毛泽东伟大的思想，决不恐惧任何形式的战争威胁。”我真想不通，打起仗来“毛泽东伟大的思想”怎样“配备”法？也许，只有曼纳（Mana）才能发出这样的神奇作用？

F 拜名

世界共产党人都有崇拜名字的倾向，中国的红卫兵尤甚。他们拆除大街的名牌。如前所述，他们把苏俄大使馆前面的大街改名“反修街”。好像这样一来，“修正主义”真的就被反对掉了。他们把北平天安门改称“东方红门。”这改换名称，似乎东方真的跟着红起来了。天下有这样方便的事儿么？他们将大部分外国使馆所在的“使馆街”改称“反帝街”。这么一改，好像“帝国主义”就被反掉了。世界上有这样轻易的事么？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胡适在他的文存里对“名教”的批评：

“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如同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

.....

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贯献》九期，江绍原小页百七八）

.....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红卫兵的作风，比写“打倒阿毛”的小孩高明多少？此四十年前写“枪毙田中义一”的旧人物有何不同？红卫兵口口声声要向旧世界宣战。可是，他们还是只会演老戏。他们的“新”从何处来？

G 狂热

从前面所展示的种种，我们已经可以知道红卫兵是一群狂热之徒。如果他们不狂热，那么他们不会爆出前面所说的种种言行。既然如此，红卫兵的狂热还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出来论的必要呢？世界共产党徒乡狂热。但是，红卫兵狂热得有点出奇，而且似乎打破了世界狂热的纪录。狂热心理的强度，它本身是盲目的，并无一定的发展方向。它像一条湍急的河，“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狂热之情，受到不同的导引，便朝不同的方向倾泻。

充满狂热的人易于犯夸大狂（megalomania）。所谓夸大狂，就是对自己作一种病态的过高估计，或对自己的能力过分作不切实际的估计。红卫兵高呼：“我们不止要掀起中国革命的风暴，我们并且把这一风暴向全世界扩张。”这是多么狂妄！

充满狂热的人易于发生违拗作用（negativism），据说苏格兰的猪颇有违拗作用。赶猪的人把它向前拖，它一定向后跑。猪又肥又大，赶猪的人往往拖的满身大汗，吃力的很。后来他心生一计，把猪故意朝后拖，猪果然向前冲，于是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有种人满肚子装了违拗作用。他不问合理不合理，反正你说东他一定论西，你说南他一定说北。怀抱违拗作用的人，并不根据任何显明的或客观的理由，来拒绝旁人对他的提示。别人这样，他偏那样。近几十年来，共产势力之所以能震撼全球，所利用的心理机械作用之一，就是靠的违拗作用。你们“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偏要那样。在这条路上，红卫兵可说登峰造极。别的国家是用绿灯表示前进，红灯表示停止。他们偏要用绿灯表示停止，红灯表示前进。大家要和平，他们却要战争。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批评，他们却高呼：“敌人恨的，我们正好喜欢。外国敌人对我们攻击，正是我们的光荣。”他们真不愧为一群苏格兰猪！

充满狂热的人易趋极端。我们简直无法设想一个狂热的人怎样心平气和地讲“中庸之道”。红卫兵被激成为斗公鸡，一只一只气昂昂，极端得出乎常情以外。在他们眼里，计程车、玩具手表、太阳眼镜，以及游乐，都是要不得的。至于花卉、古玩、金鱼、外国鸟，一概在被禁之列。这还不算，他们认为向右看是反动的，向左看才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要求部队经过检阅台前时勿向右看着台上行注目礼，而须向左看台上行注目礼。照红卫兵这一“逻辑”来说，他们还不够彻底。如果他们真够彻底的话，似乎应该自动挖掉右眼，只留左眼。因为，根据共产唯物论所立的物质基础来说，右眼是“反动眼”，左眼是“革命眼”！

四

我们在以上将红卫兵的意底牢结，行为模式，以及特征分析了一番。根据这一番分析，我们又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基本状况提出两方面的看法。

A 关于“思想”的问题

照一般的揣测，中国赤色集体已经蹬在中国大陆十七八年之久，“毛泽东思想”藉着赤色统治建构的扩展和压力，已经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可是，中国大陆竟出了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式的“歧异思想”。为着整肃这些“歧异思想”，毛泽东和林彪们就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为着展开这一“革命”，他们需要利用红卫兵。这次红卫兵最张扬的节目，就是“奉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的思想”真的已被中国赤色分子普遍接受，心悦诚服，一体奉行，那么何致于要放出红卫兵来“大力推行”呢？个中情形，耐人寻味。

B 青年问题

世界一切共产型模的统治之最毒恶的一面，也就是他们最感欣慰的一面，即是他们按照“党的型模”来塑造青年材料。这正像肥皂工厂制肥皂一样。从前帝王时代的制度，是教育太子怎样作皇带来维持万世一系的皇统。现在，共产型模的统治，是藉着制造“党奴”来维持万世一系的党统。中国大陆赤色集团是否成功地制造出一批党奴，我现在无法判断。但是，我却有十足的把握判断，他们已经成功地把下一代人制造出大批的歇斯底里患者。我说这话，一点也没轻侮那些青年的意思。我毋同情他们，同情他们那些动乱中的牺牲者。

不错，红卫兵是陈伯达们编导出来的，但是，问题在于怎样能够编导的这样有声有色。前台的后面还有后台戏。平静的地面底下还有“地下水”。红卫兵的旗帜是鲜红的，阵容是浩大的。可是，它的实质如何呢？人的颜面表情及动作身态，是没有声音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最能泄露心灵深处的内容。让我们看那些青年男女的表情吧！他们大都充满了愤怒、焦急、紧张、仇恨，希望和失望的交织。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里，怎会有这样的产品？他们在“党奴教育”中长大，听了无数伟大的诺言，心中充满了狂想曲。然而，现实呢？愈来愈令人失望，愈来愈使人不安，于是心头的压力愈来愈增加。每个人像一个小炸弹，所以一碰便爆起来了。

红卫兵是中国大陆赤色分子烧焦自己的一把火！

~~~~~

##### 【春秋史笔】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

• 佚名 •

## ◇ 联络员毛远新

如果说到毛泽东晚年的亲信——联络员毛远新，就不能不提一下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也就是毛远新的父亲之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经济专才，他的实践能力在陈云之上，和林伯渠、吴亮平并称瑞金时代的我党的经济领域中的“三杰”。毛泽民管国家银行和国民经济部以及开采钨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暗渡陈仓保证苏区的供给在党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只是因为毛泽民牺牲较早，所以，一直以来他的某些事迹还不为人知，特别是后来他化名周彬，和陈潭秋一起主持新疆我党的统战工作，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仅仅花了三年的时间使得新疆的财政走向平稳，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对这位神秘的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表示了足够的兴趣。陈云晚年专门提到毛泽民，他说：“毛泽民同志是一名非常优秀、务实的经济专家，他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财政经济领域中的人才。”

更为主要的是，毛泽民是毛泽东很少能够听进去不同意见的人。根据毛泽民的亲属回忆，毛泽东在发脾气的时候，只有毛泽民能够让他息怒，而当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罢黜之后，兄弟二人后来曾经做过一夜的长谈，内容至今无人知晓，只是后来毛泽东自己和毛远志、毛远新说过：“你们的父亲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毛泽东很少对他人谈及自己的亲属以及自己对这些亲属的观感，就是杨开慧也不例外。特别是毛泽东江西下台之后，毛泽民本人没有消极怠工，反而加倍的工作，为在野的毛泽东赢得了一定的声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晚年几次谈及他第一次去长沙求学的时候，是毛泽民卖了家里的猪供他路费，而且，不辞辛苦的挑扁担送毛泽东上路，因为为了给毛泽东、毛泽覃上学，毛泽民辍学，成为毛氏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位，毛泽民的任劳任怨、俯首甘为的精神一直是毛泽东极为称道的。1966年，毛泽东在听取李讷、毛远新的关于北京、哈尔滨红卫兵动向报告的时候，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像你（指的是毛远新）父亲那样以大局为重的人不多了，都是一心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发号施令。”

毛泽民之被派往新疆其实是毛泽东延安定下的“西进方针”的一个重要步骤，联络盛世才借以争取苏联斯大林的谅解，同时为延安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具有友好态度的合作伙伴。而派遣毛泽民前去除了发挥毛泽民的经济才干以外（盛世才提出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更为主要的是毛泽民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这一层渊源，毛泽东在众多的子侄中对毛远新历来是另眼看待，规格在李敏之上，而作为一向刻薄的江青也深知毛泽东的脾性，所以，在公开场合下，江青对毛远新总是青眼有加。外界多次有人撰文说江青在后来如何拉拢毛远新，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有资料显示，自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先后17次在北戴河办公、开会，毛远新在场的次数在九次之上，和李讷的次数是一样多的。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传很久的所谓的《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之外，在已经公开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历史意义》中披露：毛泽东在1970年前后就开始委派毛远新作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观察员”，而此后陈锡联、曾绍山因为紧跟毛远新获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实。其中，陈锡联公开称颂毛远新在辽宁的所谓的革命工作不啻于领导一场新的“辽沈战役”，而陈锡联此举遭到来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不满和申斥。

一般意义上说，如果毛泽东坚持的意见，江青是不敢反对的，虽则江青在一些时候甚至在相当时候可以左右毛泽东的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是，一旦毛泽东认同的人或者事，江青只有服从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汪东兴等人并非是江青的座上客，反而一直身居显赫的位置的原因所在。所以，毛远新之得宠和毛泽东的培养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曾经亲自问过毛远新的志向，毛远新说：“想负责，负起革命的大责任。”如果，同样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泽东很有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居然首肯毛远新的回答。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远新为了取悦毛泽东，经常请人写出来一些关于毛泽东著作和列宁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诵之后，在毛泽东的读书时间中通过自己的嘴巴讲出来，久而久之，毛泽东竟然得出结论说：“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还是强的多的。他在基层很有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又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1975年9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讷正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

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1976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1976年三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

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680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2145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

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 ◇ 肃反专家康生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之后，曾经提及对康生的印象，很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个相貌干瘦的老头是什么头号理论家，相反，他则认为康生更像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著名刽子手叶若夫。叶若夫是苏联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大清洗高潮时令人胆战心寒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子，他在一九三零年还默默无闻，然则到了一九三五年就进入当时只有三个成员的苏共中央书记处（另两位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叶若夫在臭名昭著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亲手批准杀害三万多人，他的最高政治职务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可是，即令是这样，叶若夫也不可能和文革时期的响当当的反修战士“康老”相提并论。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官运亨通是罕见的，他之所以被称作康老也是由于他的党内资格

之老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叶若夫一共才迫害了三万多人，康生在文革中制造的“内人党”惨案直接迫害无辜群众以及党员干部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致死的多达16222人。叶若夫和此公比起简直是不值一提。

康生看不起陈伯达，他对这个毛泽东一度很欣赏的大秀才嗤之以鼻，称他是“乌龙院院长”（陈伯达做过马列学院的负责人），然而，我们很少看到康生有什么传世的理论大作，唯一经手花费大力气编辑的林彪文选后来也因为九·一三事件而流产。康生之于党内的一些理论家而言，更多的是停留于口头而非笔头，而且，他的口头的理论之丰富、之狠毒、之决绝远要比那些笔头上的厉害起很多倍。一位曾经和康生共同工作十三年的前辈说过这样一番评价康生的话：“此人文不能提笔，武不能弄枪，却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哪一次整人几乎都没有被他错过，每一次党内斗争他都是胜利者的同道，连五代十国的‘长乐老’冯道也比他不得。”现在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我们还能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面容和蔼、谦逊的康生在一起探讨问题的痕迹，这位深通中国金石之学的“学究”一旦翻云覆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灾难的临头之际。

康生自己说过：“在中国搞政治有两条捷径，一个是给人家做媒人，因为做了媒人人家就要感谢你一辈子；一个是做老师，收门生，这样羽翼就扩大了。”康生素以城府很深著称，这种肺腑之言的吐露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李锐回忆中就有康生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和田家英等人大吐苦水的经过描述。但是，康生的所谓这些心里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都没有什么主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把柄落在听者的手里，相反，听者此时的唱和却经常被说者抓住，而且到了说者认为关键的时候就会立刻毫不犹豫的抛出来，作为听者的罪状之一。康生上述谈话的对象毛泽东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师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把师哲、田家英、邓拓这三位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喜爱的对象和康生的关系做一个必要的交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康生的很多侧面。

师哲一度 and 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好到两个人茶余饭后大聊各自的家世，毛泽东与师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早年都是各自母亲的支持者和父亲的反对者，所以，当师哲大谈他的母亲善良、勤劳时，毛泽东居然有了很动感情的回应，这在一生盘旋于政治漩涡中的毛泽东并不是多见的。当然，师哲的这个得宠信号没有逃脱康生的法眼，康生想尽一切接触师哲，因为共同在苏联生活的经历，康生和师哲的“共同语言”少不了，此外，康生还送来当时的奢侈品牛奶、面包和师哲共享。作为一介书生的师哲得到这位前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二号人物的照应，深感荣幸，更令师哲感到康生的温暖还在于以后的整风运动后，康生曾经亲手批准把一批被认定是特务的人分别处以枪决、囚禁等刑罚，而被处死的名单上有师哲的弟弟，康生知道之后，立刻又亲手划掉，这种法外施仁在康生则是不多见的。

田家英在最受毛泽东欣赏和赞扬时，康生是田家英府中的常客，二人不时谈论起各种感兴趣的话题，气氛十分融洽，田家英称呼康生是“东海圣人”，至于康生怎么样恭维田家英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在的回忆资料来看，有些比较肉麻的话也是少不了的。另一个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党内秀才邓拓也曾经是康生考古弄学的同伴，邓拓因为欣赏康生的对金石的学问，经常邀请康生来家里观赏各类古玩，二人就各自的心得大加畅谈，不亦乐乎。

然而，就是以上这三个人，当他们不再被划进政治的核心圈子之后，康生随即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失宠于毛泽东的师哲后来被康生诬陷以致于关进秦城监狱，多次受到来自康生亲自的“关怀”，三自一包事件遭致毛泽东不满的田家英很快收到康生的冷遇，田家英假如不是自杀，那么也很难逃过康生对他的攻击。邓拓即使自杀也没有逃过康生对他的“清算”，邓拓的古玩收藏其中一部分被康生关照抄家的造反派运到了指定的地点，随后被康生盖上了自己的收藏专用章“大公无私”收为己有。而邓拓尸骨未寒，康生送给邓拓的几顶大帽子早就赶制完成。这三

个人中只有师哲完整无缺的记录了康生的翻脸无情的经过，其他二位只能在九泉之下领受了。

#### ◇ 思想家张春桥

毛泽东虽然自己从没有说他是思想家，但是，他内心一定不会否认这点，而这点也不会有人来否认。然而，毛长期以来并不认为党内可以荣膺这种头衔的人很多，他说：“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并不多，以致于让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多年。”这句话在1966年说的时侯，指的是刘少奇，在1971年说的时侯，则指的是陈伯达。可是，无论是1966年还是1971年毛泽东说起张春桥时，他都要说：春桥是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而长年随侍左右的康生至死不过是理论家。可见，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期许之深了。

张春桥早在五十年中期就已经对毛泽东的一些建国之后的想法开始做系统的研究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完《西行漫记》就决定跟着主席吃辣椒，干革命了。”张春桥本人从来不吃辣椒，但是，因为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张春桥居然练习吃辣椒，连上海滩的徐老三徐景贤都对张春桥的揣摩功夫表示由衷的佩服。后来，中央负责徐景贤专案的人员之一的张挺透露：张春桥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的时候，经常大段大段的背诵毛泽东讲话，在毛泽东两次莅临上海时，在听取上海市委关于近期上海和华东资产阶级思想动态报告之时，毛泽东对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印象非常深刻。事后，毛泽东对大区书记包括柯庆施和李井泉、王任重说：上海有一个秀才，叫张春桥，文章写的好，政治嗅觉敏锐，值得培养。

第一次庐山会议过后，毛泽东曾经对柯庆施说：秘书要选对，也不容易，这点上我不如你，小舟、李锐都反对我，张春桥就支持你。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张春桥的看法出现新的转变。认定这位山东秀才才是无产阶级阵营的中坚力量了。

安亭事件处理结束后，毛泽东对左右说过：春桥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考虑无产阶级利益，而陶铸总是把老爷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党内也要各领风骚几百年嘛，这次春桥就领了风骚嘛。而后，陶铸下台，江青奉命传达毛泽东的这部分讲话，党内高层终于看出了张春桥的份量。

而在文革成立之初，张春桥就一直不甘心只作一个陪衬，他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全局才能。特别是和谭震林、李先念的争执，虽然张本人体现了足够的领导经济的外行，但是，却得到毛泽东的一再肯定，1966年11月，毛泽东就谭震林和张春桥的意见对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震林同志是老资格，但是，也有经验主义，现在是三娘教子，还是子教三娘？我看是子教三娘。春桥的意见值得国务院考虑，为什么喜欢当官做老爷而不愿意下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呢？”李先念随后向张春桥道歉，取得了张的谅解，而谭震林自恃毛泽东对自己的宠眷未衰，断然拒绝了张向他投来的橄榄枝，于是，终于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张的足够报复。毛泽东曾经愤怒的指责谭震林：“你已经入党了几十年嘛，怎么办？你已经活了六十六岁了，怎么办？”（这话是针对谭震林说自己不应该入党几十年，和活了六十多岁的说法）接着，毛泽东继续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春桥提醒你，你为什么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毛泽东在1967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碰头会议上的讲话）老一辈的三老四帅就此彻底的明白了毛泽东对于张春桥的态度，但是，有些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请假检讨了。

然而，林彪集团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新一轮的打击就此重新展开。

林彪最初看重的是关锋，刘志坚、萧华倒了以后，林彪在论及总政治部的人选时，曾经指

出：“罗荣桓以后，总政没有什么好人了，是庙小妖风大，谭政抵制我，也抵制其他军委领导，萧华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听罗瑞卿的，不听毛主席的，也不听我的。总理的话他也不听。关锋同志一直是穿了军装的秀才，是红秀才。”所以，在关锋的任命上，林彪一直赞同关出任副主任乃至将来出任主任。总政并不是林彪的地盘，而且，是林彪一直准备拿下的领地，多位总政主任并不是和林彪相处的非常融洽。林彪自己就讲过：我多年突出政治，以政治管军事，但是，总政总是和我唱对台戏，奇怪嘛。然而，直到林彪死前，总政的印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交给林彪。关锋的下场更是说明了这点，王关戚三人被捕是各有各的原因，而关锋的被捕和林彪的信任是有直接关系的，其中直接致命关锋的就是张春桥。

张春桥最早看出林彪准备拉拢王力、关锋进而拉拢陈伯达的意图的，中央文革内部一向山头林立，老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和代表各大区局的郭影秋等人倒了以后，就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和王关戚这几派了，其中戚本禹一直是追随江青的，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的排挤，戚本禹最终难逃厄运。而王力主要是攀附毛泽东、康生，王力的野心比较大，他是一向以邓小平、彭真等人自诩的，所以，很快失宠，但是，王力也是陈伯达赏识的人之一，王力垮台，陈伯达居然毫无办法，至于关锋，也是陈伯达的老部下之一，陈伯达以为林彪可以伸手，但是，关锋被捕，林彪有苦说不出，根本无法相援，而林彪、张春桥的结怨也由此而来。林彪对吴法宪等人说过：“不要小看了一些阴谋家，主席百年以后，他们要兴风作浪呢。”不巧的是这句话在后来的九届二中全会大区讨论时被吴法宪捅了出去，成为林彪打响反张春桥的总攻击令了。

毛泽东两次刻意的树立张春桥的权威。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天才的讨论，毛泽东首先把口风透给张，所以，才有了让吴法宪、许世友、李作鹏、韩先楚等人大发雷霆的那句“讽刺”一说，其后，韩先楚等大将因为和林彪无关被保护过关，而保护人竟然是张春桥。至于吴法宪等人自然是要追究幕后人物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事前除了江青、谢富治等极少数人知道，连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何况林彪呢。毛泽东打垮林彪是险胜，而且同林彪集团过早的暴露火力还有直接的关联。张春桥固然不是毛林翻脸的原因，但是，却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而在张春桥来说，借此打倒自己一直视为眼中钉的陈伯达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第二次是林彪死后，批判林彪。当时，周恩来、康生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是康生）的会议上和政治局打招呼会上都是强调的批左，批极左。但是，张春桥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大唱反调，说：反左不能没有界限，不能无限上纲，没有什么极左。只有极右。事后，凡是迎合周恩来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张春桥再次成为所谓真理的化身。其背后的直接授权人就是毛泽东。汪东兴曾经不无醋意的说起张春桥：“春桥同志理论水平很高，是我们党的诸葛亮呢。”

从九大到十大张春桥在毛泽东扶持之下，扶摇直上，虽然他的地位不过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实权非常可观，即使是名义上在他之前的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德生、王洪文等其实也不在他的眼中。最为说明问题的是，当华国锋将被委以重任之时，毛远新传达最高指示居然要华国锋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多和春桥商量着办。

毛泽东在得知张春桥写的“有感”一文之后，居然没有发火和恼怒，反而让江青去安慰张春桥，说起自己的难处，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居然迁就张春桥的牢骚，可见，张的炙手可热了。

张春桥之所以被毛泽东看重，除了紧跟以外和江青的美言，最为主要的是他是领会晚年毛泽东意图最为明确的一个人。后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华国锋是一个投机分子，迟早要断送主席的伟大革命成果的。”如果从结束文革浩劫的角度来看，张的评论

自然是谬误的，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继续革命论来看，张还是很有预见的。此外，长沙告状的主谋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一直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根据后来汪东兴的回忆，张春桥多次对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其实比刘少奇、林彪更有可能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在后来出尔反尔的打倒邓小平时，提到了张春桥的这句名言。

张春桥被捕以后，李先念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主席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

#### ◇ 鹰犬谢富治

谢富治一直是党史和军史上的谜一样的人物之一，因为死的比较早，所以，有些活动还是没有展开，但是，由于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艺，使得我们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到这位军功泛泛但是却异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泽东晚年的少有的宠臣身上来了。

##### 1. 谢富治和张国焘

谢富治和吴德峰、黄志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从红军时代肃反过来的，都是有名的整人专家，但是，谢富治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吴德峰虽然整人狠毒，但是，后来解放后大义灭亲，因为执法杀了自己亲弟弟；戴季英是一门忠烈，而且，解放以后他已经多次检讨有关错误，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黄志勇只是一个疯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慑力。唯独谢富治不仅胸有城府，而且，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即使是康生这样的老谋深算的人对谢富治也是畏惧三分。然而，最早发现谢的才能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国焘。

谢富治在四方面军的位置后来十分显赫，做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前一个组织部长是和张国焘的亲信之一的黄超平级，后一个则是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在四方面军的多次肃反中始终没有看到谢富治的身影，那么，他的功劳来自于何处呢？

根据现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和《公安部关于内调谢富治历史问题卷宗》以及《确认谢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报》等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负责的主要是清洗军队和分局内部不得力的干部和提供清洗的证据和名单。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指出：“谢富治在张国焘的指使下，分别就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张国焘对待一切敢于对抗所谓中央意图的措施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其中，他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此外，谢富治伙同黄超、李特对大批师长以上的指挥员进行监视、跟踪。谢富治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张国焘的赞许，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政治会议上多次夸奖谢富治是‘尖锐的锥子’。”（该书152页）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谢富治在四方面军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组织内部的，所以，这和黄超等人的穷凶极恶又有所区别。因而，在后来清算张国焘问题时，谢本人除了卖身投靠之外，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害卞继勋等人，所以，相对没有血债。得以轻松过关，而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的极力保护，谢富治只不过暂时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贬斥。随后，抗日军兴，谢富治再度还阳。

至于谢富治在清算张国焘的罪行的过程的表演，下面还要详细介绍。

##### 2. 谢富治和毛泽东

谢富治之被毛泽东激赏，正是在于他得力的揭发了张国焘的罪行。虽然，四方面军揭发张国焘的大将还有李先念、许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组织机密和人事核心的还只有谢富治，假如黄超、李特能有谢富治一半的聪明，后来也不至于死于新疆。

关于谢富治的功劳，在很多文献中不再被提及，并不是避讳张国焘的事情，而是因为谢富治已经遗臭万年了，没有必要为他评功摆好，一度，在教科书中，连陈谢兵团的字样都被取消。但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实在无法避免的提到谢富治这样异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十分罕见的提到这样一段话：“张国焘同志背着党中央在鄂豫皖地区实行军阀统治，受到了很多同志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谢富治等同志的抵制……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可见，谢富治在揭露张国焘的罪责方面确实具有足够的表现。

在延安时期，朱德、刘伯承关于揭发张国焘的组织军事路线错误的时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谢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说：“谢富治同志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最具有权威的则是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帮助教育挽救张国焘工作会议上发言：“一段时期以来，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影响了很多的同志，干部战士。前方后方，以致于很多人认识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谢富治同志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无疑，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对张国焘的致命的打击。

时隔多年以后，在延安的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及谢富治，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的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它好同志。”这段话更加可以说明谢富治在整顿张国焘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正是由于谢富治顽强的表现，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为他走向新的起点奠定了基础。

### 3. 谢富治的“功勋卓著”

而谢富治真正表现出他巨大的杀伤力和足够的城府以及手腕则是在于1959年之后。

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提名入选公安部长的人选除了杨成武、杨勇、张际春等人外，还有张宗逊。但是，毛泽东直接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这样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实等于告诉刘少奇等人，谢富治是合适的人选。谢富治当选之后，毛泽东还对其它常委做过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毛泽东思想万岁》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123页）

而谢富治上任之后，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不仅给毛泽东留下了坚定的印象，而且，保护了康生，联络了林彪，从而使他的位置日益巩固起来。

康生在上海时期有一段历史是始终说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赵容被捕而后居然很快释放的事件，这件事，舒同、饶漱石分别和毛泽东谈起过，特别是饶漱石主政华东之时，专门为此

作过调查，并且把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批示却在1960年，非常奇怪，而且，还是直接批给谢富治的。谢富治衔命南下，历时一段时间后，作出新的结论，新的结论在1965年底，毛泽东把它交给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过江青传话给毛泽东：“主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永远是主席的一个老兵。”而后在接见红卫兵南下揪斗王任重代表团时，康生当着谢富治的面说了这样一番意义含蓄的话：“富治同志经验丰富，目光敏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他才是我们党的肃反战线的杰出代表呢。”出自党内著名肃反专家之口的评价显然非常重要。而同时让康生胆寒的是，谢富治显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为人，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的。而谢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势力，康生显然更清楚。

陆定一是刘少奇或者说是1959年之前毛泽东在宣传战线的代言人，当时，他一身兼任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文化部长、副总理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数一数二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严慰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惹来了麻烦。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谢富治手中侦破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关键是谢富治把这个人情做给了江青，成为江青代表游泳池和毛家湾联络的启机。从此，江青就不再把谢富治看作一般的战友，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的战士”了。至于林彪无疑更加对谢富治的表现表示出足够的热情。九大预备会上，林彪提议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当然，他知道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处理王光美专案问题上，江青名义是顾问，其实是灵魂，而直接决定把处理大权交给江青的正是谢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最高敬礼”的时候，江青说出了真话：“没有富治同志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侦破能力，我个人是非常渺小的。”骄横一时的江青说出这番话也不是偶然的。

#### 4. 谢富治的为人

谢富治冷酷无情的一面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曾志曾经回忆毛泽东之于陶铸，她以一个跟随毛泽东多年的战友的眼光观察毛泽东之后，她说：“主席其实不喜欢陶铸，因为陶铸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话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谢富治显然是因为所谓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两次较大的历史漩涡中获得“新生”。

在毛家湾最为鼎盛的时候，谢富治是林彪夫妇的座上客，吴法宪空运来的螃蟹，叶群总不忘给谢富治、刘湘屏夫妇送去，而获得了副统帅的馈赠以后，谢富治也要连忙过府道谢，一来一往，关系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泽东命令谢富治调查黄永胜的时候，谢富治不仅十分卖力，而且，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多次和人说起一首诗，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谈及的对象包括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其中许世友、韩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释。毛泽东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后来南巡著名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到了黄永胜的这首诗，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后，在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让黄永胜在总参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黄永胜在念报告时辞不达意、三度说错，极为狼狈。毛泽东听说之后，说道，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消灭林彪集团过程中，谢富治已经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部署毛泽东的指示，给林彪、黄永胜以最后的一击。特别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执勤人员分布在指定地点，虽则没有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所肯定。连周恩来都承认，谢富治同志心思缜密，能力突出。由于谢富治的病重，毛泽东不得不启用吴忠、李德生、吴德等人作为后备，但是，他们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志商量解决并告总理知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谢富治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后，用江青的话说，主席赞赏富治同志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

谢富治是深深知道江青之于毛泽东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江青阵营出现麻烦，谢富治总是第一个露面，不遗余力的办理，比如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叛徒事件、张春桥妻子李文静叛变事件等，谢富治都是第一时间出动，紧急平息异议，就此深得江青的器重。所以，尽管谢富治独邀天宠，但是，从来没有受到来自江青阵营的冷箭。谢富治虽然不能和周恩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他却一直受到了来自毛泽东、江青不同方向的认同。

可以这样说，如果谢富治不死的话，十大之上，李德生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谢富治的。

谢富治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扩大于文革，但是，却形成于延安，回想起另一位杀手一类的人物康生的逐步得宠，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心机的发展取向了。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